

【国民经济】

中国劳动力转移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张广婷¹, 江静², 陈勇³

- (1. 南京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46;
2. 南京大学经济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3;
3.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 北京 100732)

[摘要] 本文采用劳动力配置效应模型研究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背景下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实证结果发现,1997—2008年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对劳动生产率提高和GDP增长的贡献分别为16.33%和1.72%。分地区看,剩余劳动力转移对中部地区劳动生产率和GDP提高的影响要明显高于东部地区,而西部地区在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受益最小。为应对当前剩余劳动力总量的减少、转移速度减慢以及对劳动力需求结构的变化,政府应该在加快城市化进程、发展中小企业、加强农村剩余劳动力教育培训、调整经济结构实现本地就业等方面做出努力。

[关键词] 农村剩余劳动力; 劳动力转移; 经济增长; 二元经济结构

[中图分类号]F2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80X(2010)10-0015-09

一、引言

长期以来,中国的人口和劳动力资源主要集中在农村地区和农业部门,因而导致农村一直存在比较严重的劳动力过剩问题。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农村人口大约为7.2亿人,当前约有1.2亿农民进城务工,农村剩余劳动力多达2.4亿人。中国在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同时,如何有效地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在彻底解决“三农”的同时有效促进经济增长,成为当前以及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

国外大量研究都侧重于劳动力转移本身,其焦点在于为什么会出现劳动力转移。Ravenstein(1885)指出,经济因素是人口转移最为重要原因;Lee(1966)提出了解释人口空间流动的“推—拉理论”;W. Arthur Lewis(1954)认为工资差异直接导致了劳动力转移,而Jorgenson(1961)认为是消费结构的变化,Tbdaro(1969)则认为是“预期”收入变化导致劳动力转移。国内学者则较为关注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张保法(1997)证明了由农村劳动力转移引起的劳动力投入结构变动是中国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的一个组成部分;李实(1997)的研究表明,外出劳动力对家庭总收入的边际贡献率明显高于非外出劳动力的边际贡献率,且对家庭中其他劳动力报酬率的提高产生积极

[收稿日期] 2010-08-15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公共财政视角下中国逆服务化趋势与服务业分类发展战略研究”(批准号71003046);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基于租金和价值链治理视角的跨国公司研发外包理论、实证与中国的应对政策”(批准号70972063)。

[作者简介] 张广婷(1986—),女,安徽六安人,南京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江静(1975—),女,江苏江阴人,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陈勇(1974—),男,湖北咸宁人,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博士后。

影响;潘文卿(1999)指出,劳动力从低效率部门向高效率部门转移提高了劳动力的总效率并促进了经济增长,这也得到了李扬、殷剑峰(2005)以及李勋来、李国平(2005)的支持。而盛来运(2007)指出中国是非常典型的二元结构国家,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明显,这是农村人口迁移的动机。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本文构建了符合中国经济发展的城乡劳动力转移模型,利用全国各地区面板数据分析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二、理论分析:二元结构模型

伴随着经济的增长,中国的产业结构也在发生变化。在这种结构变动的过程中,部门间的资源流动(主要指劳动力由农业部门流向非农业部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不容忽视的。劳动力再配置过程中所带来的经济效应即为劳动力转移效应。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效应具体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资源的再配置效应;二是比较优势效应;三是市场潜力释放效应;四是促进城市扩展和集聚效应(李勋来,李国平,2005)。因此,农村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具有巨大的效应,这种效应即为经济增长的源泉和动力。

造成劳动力发生转移的原因是由于不同部门间劳动生产效率的不同,劳动力从生产率低的部门向生产率高的部门转移,这样势必提高劳动力的总体生产效率。因此,在测量劳动力在不同边际生产率部门之间发生转移而对经济增长发生作用时,就要比较生产率总增长率与生产率部门增长率的加权平均数,两者之间相差的部分就是劳动力再配置或劳动力转移所产生的经济效应。本文在借鉴钱纳里等人(Chenery et al.,1986)模型的基础上来测算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强调了我国剩余劳动力转移效应的时间阶段性和区域差异性,这也是与钱纳里等研究的不同之处。

假设经济中存在两个部门: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 $Y=GDP$ 表示为社会总产出, g 为总劳动生产率, L 表示部门就业人口,且总产出可表示为总的劳动生产率 g 与投入的总劳动力数量 L 之积。 $0,1$ 分别表示期初和期末两个点, $i=1,2$ 分别表示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则有 $g=\frac{Y}{L}$,且 $g_1=g_0+\Delta g$, $L_1=L_0+\Delta L$ 。

因此,总产出的增长可以表示为:

$$\Delta Y=Y_1-Y_0=g_1L_1-g_0L_0=g_0\Delta L+\Delta gL_0+\Delta g\Delta L \quad (1)$$

用 m_s 表示为各要素的增长率,为计算各要素增长率,将式(1)两边同除以 Y_0 ,可得:

$$\frac{\Delta Y}{Y_0}=\frac{\Delta L}{L_0}+\frac{\Delta g}{g_0}+(\frac{\Delta g}{g_0})(\frac{\Delta L}{L_0}) \quad (2)$$

即 $m_Y=m_L+m_g+m_Lm_g$,可知经济增长率 m_Y 有两个影响因素,一是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 m_g ,二是劳动投入的增长率 m_L 。且总产出增长率的值是由劳动力增长率、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以及二者乘积共同构成的。本文分别令 K_L 和 K_g 为劳动力增长率和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则有:

$$K_L=\frac{m_L}{m_Y}, K_g=\frac{m_g}{m_Y}, K_{Lg}=\frac{m_Lm_g}{m_Y} \quad (3)$$

由于本文将整个国民经济划分为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为了进一步区分这两个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有:

$$g=\frac{Y}{L}=\frac{Y_1+Y_2}{L}=\frac{Y_1}{L_1}\frac{L_1}{L}+\frac{Y_2}{L_2}\frac{L_2}{L}=g_1e_1+g_2e_2 \quad (4)$$

由上式可知,总劳动生产率可分解为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加权平均和,权数为农业和非农业部门各自就业人口占总劳动力人口的比重, e_1 、 e_2 分别代表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的就业比重。对式(4)两边关于时间求微分后,再除以 g 可得:

$$m_g = \frac{g_1 e_1}{g} g_1' + \frac{g_1 e_1}{g} e_1' + \frac{g_2 e_2}{g} g_2' + \frac{g_2 e_2}{g} e_2'$$

由此可知,总劳动生产率是由以下两部分构成:一是不同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加权平均数,反映产业部门劳动生产率变化对总体劳动生产率的作用;二是具有不同劳动生产率的部门之间的劳动力流动,即为第二项代表了两部门之间就业的变化对总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即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配置效应,记为 $N(g) = \frac{g_1 e_1}{g} e_1' + \frac{g_2 e_2}{g} e_2'$ 。由 $L=L_1+L_2$ 可知 $e_1+e_2=1$,两边对时间求导可得:

$$e_1 e_1' + e_2 e_2' = 0, e_1' = -\frac{e_1 e_2'}{e_1} \quad (5)$$

将式(5)代入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配置效应 $N(g)$ 表达式,可得:

$$N(g) = \frac{g_2 - g_1}{g} e_2 e_2' \quad (6)$$

式(6)为在实际测算中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配置效应公式。从上式中可以看出,只要非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 g_2 大于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 g_1 ,劳动力转移效应就始终存在。当两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相等时,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将停止,此时,两部门间劳动力流动处于动态平衡状态。且知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对总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总产出增长的贡献以及劳动力增长的贡献分别表示为:

$$K_g = \frac{N(g)}{m_g}, K_Y = \frac{N(g)}{m_Y}, K_L = \frac{N(g)}{m_L} \quad (7)$$

三、实证分析

1. 数据来源和变量定义

本文采用 1997—2008 年全国及各省区市的面板数据进行描述性实证研究,由于西藏自治区数据严重缺失以及重庆成为直辖市是在 1996 年,缺乏相关数据,故本文舍弃了这个两个样本数据,选取了中国其余 29 个省区市统计数据。本文的数据来源主要是三个方面:中国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1997—2009 年《中国统计年鉴》和历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劳动力转移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可以通过以下几个变量具体表示:

劳动生产率(g):劳动者在一定时期内创造的劳动成果与其相适应的劳动消耗量的比值。劳动生产率水平可以用同一劳动在单位时间内生产某种产品的数量来表示,单位时间内生产的产品数量越多,劳动生产率就越高,反之,则越低;也可以用生产单位产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来表示,生产单位产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越少,劳动生产率就越高,反之,则越低。本文采用前者。

国民经济增长率(m_Y):即 GDP 增长率,测量经济增长的指标,GDP 的持续、稳定增长是政府着意追求的目标。经济增长率也称经济增长速度,它是反映一定时期经济发展水平变化程度的动态指标,也是反映一个国家经济是否具有活力的基本指标。实际 GDP 是用固定基期价格计算出来的全部最终产品的市场价值,采用实际 GDP 指标来反映经济增长,能够较真实反映经济的增长。

劳动力增长率(m_L):以百分比表示的劳动力人口增长速度,一定时期内(通常是 1 年)劳动力增长数对期初数之比。计算结果表明年末人口数比年初人口数增长百分之多少。

劳动生产率增长率(m_g):是指期末的劳动生产率比期初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的百分比。与此相对应的有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增长率(m_{g_1})和非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增长率(m_{g_2})。

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的贡献(K_Y):在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劳动力潜能被释放到非农业部门,从而创造出更多的国民生产总值,从而对总 GDP 的增加产生影响。同理,还有劳动力转移对劳动力增长的贡献(K_L),劳动力转移对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贡献(K_g),都体现出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对经济增长的各个方面的影响。

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再配置效应($N(g)$):具有不同劳动生产率的部门之间的劳动力流动,代表了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之间就业变化对总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影响。依据前文理论分析可知,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对总产出增长的贡献即可表示为 $N(g)$ 与经济增长率之比。即劳动力再配置带来的经济效益,属于资源再配置效益或结构转换效益,因为劳动力转移是资源的再配置过程,最终通过总生产率的提高来影响经济增长。

2. 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效应的实证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劳动生产率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从图 1 可以看出,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在部门间很不平衡,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增长较缓慢,非农业部门增长迅速,使得两部门之间的生产率差距逐渐扩大。1997 年非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是农业部门的 10.54 倍,到 2008 年扩大到 13.02 倍,二元经济结构显著。从图 1 中可以明显看出我国二元经济的结构状况,农业劳动生产率不到全国平均生产率水平的一半。因此,将低生产率部门的农业富余劳动力转移到高生产率的非农业部门,有利于提高全国生产率水平,促进经济增长。同时,可以减少参与农业价值分配的人数,提高农业生产率的增长速度,缩小农业部门、非农业部门间的生产率差距,逐步打破二元经济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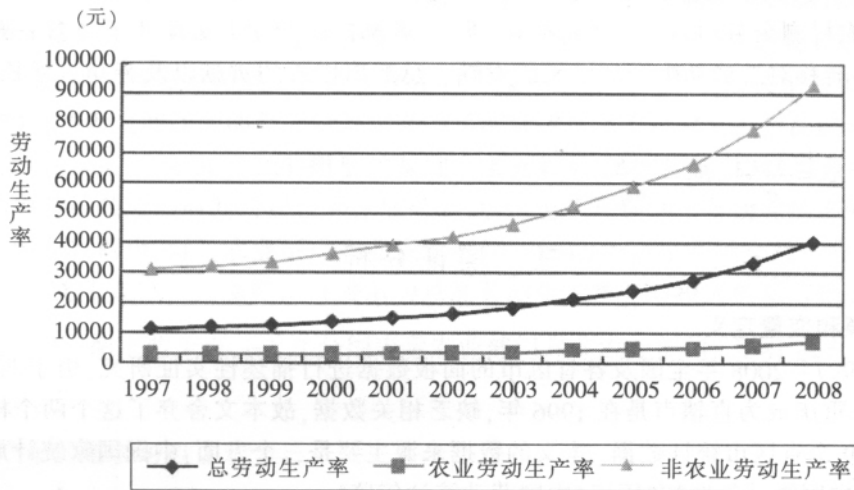


图 1 1997—2008 年全国农业与非农业劳动生产率差异

劳动力再配置效应即为劳动力从生产效率低的部门转向生产效率高的部门,从而引起整个经济体系总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带动相应地区经济的发展。表 1 显示,按 1978 年不变价计算,全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由 1997 年的 2944.98 元/人年,增加到 2008 年 7129.68 元/人年,增长了 2.42 倍,年均增长 12.92%;非农业劳动生产率由 1997 年的 31052.93 元/人年,增加到 2008 年的 92798.08 元/人年,增长了 2.99 倍,年均增长 18.08%;全国总劳动生产率由 1997 年的 11310.94 元/人年增加到 2008 年的 40532.40 元/人年,增长了 3.58 倍,年均增长 23.49%,均有明显增长。其中,农业部门产值在总产值中所占比重从 1997 年的 18.3% 逐渐下降到 2008 年的 10.7%,平均每年下降 7.05%。与此同时,非农部门产值所占比重则从 1997 年的 81.7% 上升到 2008 年的 89.3%。由此可看出劳动力转移带来产值的变化。

表 2 列出了全国 1997—2008 年期间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带来的资源再配置效应。可以看出,总体上,以 1978 年不变价计算的全国总产出(GDP)从 1997—2008 年年均递增 13.27%,劳动力增长 0.98%,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增长 12.19%,劳动力转移对劳动力增长的贡献为 27.61%,对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贡献为 16.33%,对 GDP 增长的贡献为 1.72%,对农业和非农业部门产值增加的贡献分别 4.73%、1.48%。

表 1 1997—2008 年全国农业和非农业生产率和就业分布

年份	生产总值及各部门所占比率				劳动生产率(元/人年)			劳动力比重(%)	
	GDP(亿元)	$\Delta Y/Y$	Y_1/Y	Y_2/Y	总生产率	农业	非农	农业	非农
1997	78973.00	9.9	18.3	81.7	11310.94	2944.98	31052.93	70.2	29.8
1998	84402.30	6.4	17.6	82.4	11948.74	3022.70	32191.29	69.4	30.6
1999	89677.10	5.9	16.5	83.5	12560.87	3015.39	33422.76	68.6	31.4
2000	99214.60	9.6	15.1	84.9	13763.56	3054.05	36400.11	67.9	32.1
2001	109655.20	9.5	14.4	85.6	15016.12	3215.10	39212.16	67.2	32.8
2002	120332.70	8.9	13.7	86.3	16318.51	3377.66	41886.88	66.4	33.6
2003	135822.80	11.4	12.8	87.2	18247.90	3562.33	46195.68	65.6	34.4
2004	159878.30	15.0	13.4	86.6	21260.41	4394.69	52298.53	64.8	35.2
2005	183217.40	12.7	12.2	87.8	24163.19	4623.25	58833.34	64.0	36.0
2006	211923.50	13.5	11.3	88.7	27738.68	4998.96	66366.48	62.9	37.1
2007	257305.60	17.6	11.1	88.9	33420.65	6009.03	77914.34	61.9	38.1
2008	314045.00	18.1	10.7	89.3	40532.40	7129.68	92798.08	61.0	39.0

表 2 1997—2008 年劳动力转移对劳动生产率及经济增长的贡献

	项目	1997—2000	2001—2004	2005—2008	1997—2008
生产率(元/人年)	g	12396.03	17710.74	31463.73	20523.50
	g_1	3009.28	3637.44	5690.23	4112.32
	g_2	33266.78	44898.31	73978.06	50714.38
增长率(%)	m_Y	8.68	12.71	18.43	13.27
	m_{Y1}	1.63	9.67	12.18	7.83
	m_{Y2}	10.22	13.25	19.32	14.26
	m_L	1.12	1.06	0.75	0.98
	m_{L1}	-0.05	-0.11	-0.75	0.09
	m_{L2}	3.83	3.41	3.35	3.53
	m_g	7.48	11.53	17.55	12.19
	m_{g1}	1.67	9.79	13.05	8.17
	m_{g2}	6.16	9.51	15.45	10.37
贡献率(%)	K_g	27.02	16.05	12.08	16.33
	K_{g1}	120.61	18.90	16.25	24.36
	K_{g2}	32.81	19.45	13.72	19.18
	K_L	68.48	24.77	18.93	27.61
	K_{L1}	-2912.84	-659.65	-90.03	-220.74
	K_{L2}	19.46	6.97	4.76	7.33
	K_Y	8.51	2.19	0.89	1.72
	K_{Y1}	38.88	6.89	2.25	4.73
	K_{Y2}	7.14	1.87	0.77	1.48
劳动力转移效应(%)	$N(g)$	2.02	1.85	2.12	1.99

可见,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转移的过程中,增加了农业部门的 GDP,且增加的幅度要远大于非农业部门增加的幅度。同时,农村劳动力转移对两部门生产率提高的贡献分别为 24.36% 和 19.18%,进一步表明农业部门存在多余劳动力是造成农业部门生产率长期较低的原因,且转移出来这部分多余劳动力会使得两部门生产率同时得到较大提高。由于一部分农业部门劳动力转移到非农部门,造成了农业部门劳动力增长为负数,因此,劳动力转移对农业部门劳动力增长的贡献

在表中为负。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在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中,由于劳动力从效率低的农业部门转向效益高的非农产业部门所产生的效应为 1.99%,这也正是全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再配置效应。

分阶段看,1997—2000年,由于东南亚爆发金融危机,宏观环境较差,受其影响,全国 GDP 年均增速仅为 8.68%,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增长 7.48%。这期间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对全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贡献为 27.02%,对 GDP 增长的贡献为 8.51%。“十五”期间的 2001—2004 年,全国经济开始出现高增长,GDP 年均增长 12.71%,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高达 11.53%,劳动力增长约为 1.06%。这一时期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对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所带来的贡献约为 16.05%,对 GDP 增长的贡献为 2.19%。在经济进一步增长的 2005—2008 年期间,GDP 年均增长 18.43%,劳动力每年按 0.75%的增速增长,且劳动力转移对 GDP 的贡献率为 0.89%,劳动力转移对生产率的提高的贡献为 12.08%。由此可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巨大作用。同时,可以看出,劳动力在转移过程中的增速是不断递减的,从第一阶段的 1.12%到第三阶段的 0.75%,劳动力总供给并不是无限递增下去,而是呈现递减趋势。

分地区看,1997—2008 年间,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中,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如表 3 所示)。在三个阶段中,东部地区劳动生产率从 25714 元/人年上升到 82638 元/人年,平均年增长 12.12%,中、西部地区的增速分别为 31.14%和 27.52%^①。说明劳动力转移带来生产率提高的过程中,对中部地区作用最为明显,其次为西部地区。原因是中、西部地区是劳动力转移出来的主要地区,故产生的影响也最为显著。劳动力转移对 GDP 增长的贡献东部为 11.61%,中部和西部分别为 18.51%、3.88%,可以看出,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出来的过程中,对国民产值增长产生了巨大贡献,且对各地区的作用也不相同,其中对中部地区产值的增加贡献最大,因为中部地区是劳动力转移输出地区,劳动力技能水平得到提高,因而产生的溢出效应加速了其工业和服务业等非农业部门的大力发展。对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贡献中三个地区分别为 10.07%、15.98%和 2.53%,由此可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全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不变。同时,进一步的分析可知,在东部、中部和西部所有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中,劳动力从效率低的农业部门转向效益高的非农产业部门所带来的贡献分别为 1.60%、1.80%和 0.17%。其中中部地区较高,这也说明了中部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逐渐崛起,一部分劳动力则从东部沿海地区转而在经济逐渐发展的中部地区,同时剩余劳动者本身在转移过程中减少了自己的转移成本。可知,东部沿海地区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虽然作为劳动力的主要输入地,但在近期发展过程中劳动力转移经济效应却低于中部地区,且西部地区的转移效应也在不断体现。其中主要是由于一部分劳动力就地转移造成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同时又由于东部发达地区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导致资本、技术向外扩散而促进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

由此可知,随着时间的推移,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效应的差距会逐渐缩小。一是中西部地区作为劳动力输出大于转入的地区,劳动力转出减轻了本地区农业经济的资源承载力,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二是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由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导致的就业结构调整缩小了与产业结构的偏差,资源配置趋于合理;三是转移劳动力的回流,带来了技术和资本,为发展本地非农产业提供了有力条件;四是 1999 年制定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在进入全面实施阶段后,增强了西部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更大程度地发挥了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推动了西部地区劳动力与资源结构、产业结构的和谐发展。同时,东部地区由于不能完全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城市化相对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滞后的城市化水平又阻碍了农业现代化和农业产业化进程,在人口分布重新调整的基础上优化整个社会的经济结构也需要一个过程。因此,农村劳动力转移效应增长速度放缓,逐步进入调整过程。

从表 3 可以看出,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农村劳动力转移经济效应分别是 1.8%和 1.6%,两地区差

^① 这里,劳动力增长率与表 3 中的 m_g 略有差别,表 3 中的 m_g 是根据三阶段增长率以后的再次平均,重点在于看三阶段不同的增长趋势。

别不大,中部略高于东部地区,呈现齐头并进的发展趋势。另外,中部地区各阶段波动相对比较平稳,西部地区随国家政策变化波动比较大。

表 3 1997—2008 年不同地区劳动力转移对劳动生产率及经济增长的贡献

项目	地区	年均增长				项目	地区	年均贡献			
		1997-2000	2001-2004	2005-2008	1997-2008			1997-2000	2001-2004	2005-2008	1997-2008
g (元/ 人年)	东部	25714	38659	82638	49004	K_Y (%)	东部	16.70	8.92	9.20	11.61
	中部	11277	16909	49905	26030		中部	42.30	2.02	11.22	18.51
	西部	10021	13144	40353	21173		西部	0.12	10.41	1.12	3.88
m_Y (%)	东部	11.02	14.79	17.72	15.83	K_L (%)	东部	30.26	12.12	4.67	15.68
	中部	7.21	13.35	18.54	19.55		中部	56.59	2.14	8.04	22.26
	西部	25.36	2.69	18.74	20.80		西部	0.28	6.53	0.78	2.53
m_L (%)	东部	6.08	10.89	34.91	17.29	K_g (%)	东部	13.41	12.12	4.67	10.07
	中部	5.39	12.60	25.88	14.62		中部	37.75	2.14	8.04	15.98
	西部	10.72	4.29	27.04	14.01		西部	0.13	6.53	0.92	2.53
m_g (%)	东部	13.72	10.89	34.91	19.84	$N(g)$ (%)	东部	1.84	1.32	1.63	1.60
	中部	8.08	12.60	25.88	15.52		中部	3.05	0.27	2.08	1.80
	西部	23.15	4.29	22.76	16.73		西部	0.03	0.28	0.21	0.17

注: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 11 个省;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湖南、湖北、河南 8 省;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10 个省份。

四、政策建议

中国劳动力转移虽然为经济的高速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最近几年来劳动力转移速度出现了明显下降。原因之一固然是劳动力总供给的减少,但是,劳动力转移的主观动力不足、对劳动力技能的要求提高导致劳动力供需的结构性矛盾是其中的根本性原因。尤其在制造业发达地区,技术工人尤其是高级技能人才的短缺状况更加严重。而中国当前老龄化问题较为突出,大规模人口的“未富先老”也将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压力和挑战。针对上述问题,本文认为,要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充分发挥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必须从加快城市化发展入手,在劳动力的需求、供给以及区域等几个层面实现突破。

1. 通过城市化的发展来加速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进程

当前,在中国以 GDP 增长为导向的地方官员晋升和考核制度下,生产要素并不能实现跨地区的自由流动,尤其是劳动力最为典型,其具体表现就是户籍制度。户籍的限制使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受到了根本性的打压。目前,大多数地方政府奉行的是“地方财政提供地方公共服务,并且不愿意让外来人口分享本地公共服务”(陆铭,2010),尤其是在就业岗位、社会保障和教育医疗等方面,非本地居民大部分是被排除在外的。因此,城市化的加速要从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开始,将以身份和出生地划分人口类型的传统户籍制度,改变成以职业和居住地划分人口类型的新型户籍制度,承认已有固定职业和稳定收入的进城农民的社会地位,保障其拥有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合法权益,逐步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实现人口的自由迁徙并建立起城乡一体化的户籍管理制度,从根本上改变农民工的身份。

当然,部分地区城市化的具体做法值得商榷。政府把农民的户口性质改为城市居民,收回宅基

地而让其居住到公寓式高楼去。政府没有发展足够的工业、创造足够的就业岗位使其能够融入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农民的性质依然没有改变,依然要依靠种地为生(甚至有些地区将农民的自留地也收回,农民处于失业状态)。这种“就地式”的城市化并不能加快劳动力转移的进程。这也是当前城市化的一个误区。城市化并单纯指农村就地进城,而且也包括让城市中现有的由农村转移过来的剩余劳动力能够获得当地的户籍,从而享受当地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此外,积极完善各项社会保障制度,尤其加强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养老保险制度的建设,建立包括农民工在内的面向所有人的社会安全和保障机制,也是巩固城市化发展,避免人口结构老化后老一代的农民工大举返乡带来“去城市化”现象的重要保障。

2. 发展中小企业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充足的就业岗位

吴敬琏(2002)指出,要加速农村劳动力转移,首先是要创造足够的就业岗位。农村剩余劳动力要想在城市稳定下来的首要条件是城市能够提供稳定收入的就业岗位。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中小企业是吸纳劳动力、解决就业问题的重要途径。1975年美国有4637.3万人在雇佣劳动力少于500人的企业工作,占总就业人口的76.6%;1991年日本79.2%的就业人口受雇于中小企业;欧盟的情况更是突出,当前中小企业已经占总企业数的99.8%,就业人口占总数的66%。中国经济转型时期,发展中小企业解决剩余劳动力就业、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有着更为积极的现实意义。中国现阶段农村转移的剩余劳动力普遍存在教育文化程度不高、专业技能相对较差等缺陷,因而发展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成为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关键。中小企业就业门槛相对较低,对技术水平的限制较少,因此,较低技术水平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够相对容易地满足中小企业的岗位需求,从而为转移劳动力提供源源不断的就业岗位。政府在这方面可以采取的措施在于减少中小企业税赋,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措施,一方面为中小企业提供宽松的生存环境,另一方面通过财税政策来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自主创业,不仅解决其自身就业问题,而且能为更多的劳动力提供就业岗位。

3. 加强农村剩余劳动力教育培训,提高劳动者素质和效率

当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结构性矛盾在于企业和社会对劳动力的素质和技能要求不断提高,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出现的“民工荒”也是该矛盾的突出表现。因此,加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劳动力的技能和素质,可以缓解供需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不仅可以提升现有劳动力的劳动生产率,而且也可以将非劳动力或潜在的劳动力转化为现实的劳动力。对农民工的输出地来说,政府在组织劳务输出时,要搞好农民工外出前的基本权益保护、法律知识、城市生活常识、寻找就业岗位等方面的信息培训,从而提高农民工遵守法律法规和依法维权的意识。对农民工的输入地来说,政府要充分利用各种社会教育资源,采取有效措施来整合各类教育资源,统筹规划和实施对农民工的教育和培训,通过委托具备一定资格条件的各类职业培训机构来为农民工提供形式多样的培训。对一些费用过高的培训,政府应适当地承担部分培训费用,减少农民工进城务工的劳动成本。引导那些经过培训且具有一定技能的劳动力进入工资水平相对较高的地区,这样也会对工资相对较低的地区造成压力,对提高农民工的工资待遇起到促进作用。同时,流出地政府要加强就业指导,强化跨地区的劳务合作,加强驻外劳务机构建设,动员社会力量发展有组织的劳务输出,加强对劳动力市场信息的分析、预测和发布,为农民工流动提供及时全面的信息引导。

4. 发挥中、西部地区比较优势,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实现本地就业

中、西部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东部地区相比呈现显著不同的特征,转移经济效应也明显低于东部沿海地区,但这种差距在逐渐缩小。实证可知,在劳动力转移效应的地区效应中,中部地区已经接近并有超过东部地区的优势,且随着产业链向西部的梯度转移,中、西部地区能源、矿产、劳动力成本等方面的明显优势非常适合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加工贸易,因此,也会有越来越多的东部劳动力带着资本和技术进入中、西部地区,大量农民工回乡创业,带来中、西部地区劳动力资源的富集,这给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同时也给那些富余劳动力更多的选择余地,优化

了劳动力资源配置,节约了劳动力背井离乡的打工成本。因此,政府应当鼓励和提供相关政策使得这些劳动力以各种形式在中、西部地区就业。

东部地区应该从自身的条件出发,加大企业内部的管理体制和用工体制的创新,提高劳动力的使用效率,在节约劳动力成本的过程中培养出一部分价值高的劳动力,从而继续充当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火车头”作用。从地区情况看,我国经济增长的重心也在发生转移,表现为农民工从“珠三角”向“长三角”的流向转移;可以说,“长三角”比“珠三角”更倾向于注重人力资本的经济发展战略。因此,经济重心在地区之间的转移,实际上也体现了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型。

[参考文献]

- [1]Chenery. H., S. Robinson & M. Syrquin. Industrialization and Growth: A Comparative Study [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
- [2]Lewis, W.A.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y of Labor [J]. Journal of the Manchester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Social Studies, 1954,(20).
- [3]Todaro,Michael P. A Model of Labor Migration and Urban Unemployment in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9,(59).
- [4]Stark,O., and Taylor,J.E. “Migration Incentives,Migration Types: The Role of Relative Deprivation[J]. Journal of Economics,1991,(101).
- [5]Jorgenson,W.E.The Development of a Dual Economy[J]. Journal of Economics,1961,(11).
- [6]Lee, E.S. A Theory of Migration[J]. Demography, 1966,3(1).
- [7]Ravenstein, E.G.The Law of Migration[J]. 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1885,48(2).
- [8]李勋来,李国平. 经济增长中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效应研究[J]. 经济科学,2005,(3).
- [9]陆铭. 重构城市体系——论中国区域和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J]. 南京大学学报,2010,(5).
- [10]潘文卿. 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效益测评[J]. 统计研究,1999,(4).
- [11]盛来运. 农村劳动力外出的动因[J]. 中国统计,2007,(6).
- [12]李实. 中国经济转轨中劳动力流动模型[J]. 经济研究,1997,(1).
- [13]李扬,殷剑峰. 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高储蓄、高投资和中国经济增长[J]. 经济研究,2005,(2).
- [14]吴敬琏.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三农”问题[J]. 宏观经济研究,2002,(6).
- [15]张保法. 经济增长中的结构效应[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1997,(11).

The Impact of Chinese Rural Surplus Labor Transfer on Economic Growth

ZHANG Guang-ting¹, JIANG Jing², CHEN Yong³

- (1. School of Economics, Nanji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Nanjing 210046,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
3. Institute of Finance and Banking,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study the mechanism of the rural surplus labor's transfer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using the labor allocation model under the Chinese urban-rural dual economic structure. The empirical results indicate that from 1997 to 2008, the impact of the rural surplus labor's transfer on the whole society labor productivity and GDP growth was 16.33% and 1.72%. Regionally, the surplus labor's transfer on labor productivity and GDP is highest in the central region, while the western region benefits the least. With the decrease of the total amount of surplus labor, the low labor transfer and the change of the labor structure demand, it is urgent for the government to speed up the urbanization, develop the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 increase the labor force skills training and change the mod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o realize local employment.

Key Words: rural surplus labor; the transfer of labor force; economic growth; dual economic structure

[责任编辑:鲁舟]